

中国妇女生育率变动趋势分析

杨书章 顾宝昌 肖自力 王彦祖

客观、历史、辩证地研究分析中国人口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控制人口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以下简称2%抽样调查)数据为根据,分析80年代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CBR)、总和生育率(TFR)和总和递进率(TPPR)的变化历程,阐明当前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由来(主要指70年代)、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80年代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基本格局

表1 1978~1987年全国粗出生率(CBR)、总和生育率(TFR)和总和递进生育率(TPPR)

年份	TFR	TFR1	TFR2	TFR3	TFR4*	CBR	TPPR	TPPR1	TPPR2	TPPR3	TPPR4*
1978	2.767	0.787	0.636	0.491	0.853	18.25	2.939	0.971	0.925	0.62	0.423
1979	2.808	0.884	0.689	0.479	0.756	17.82	2.913	0.976	0.926	0.593	0.418
1980	2.31	0.917	0.591	0.328	0.474	18.21	2.472	0.979	0.877	0.429	0.187
1981	2.607	1.166	0.622	0.333	0.486	20.91	2.566	0.990	0.877	0.458	0.241
1982	2.858	1.372	0.693	0.357	0.436	23.03	2.669	0.996	0.880	0.490	0.303
1983	2.407	1.177	0.632	0.289	0.309	19.44	2.309	0.993	0.793	0.356	0.167
1984	2.333	1.108	0.654	0.298	0.273	19.19	2.264	0.992	0.751	0.345	0.176
1985	2.173	1.011	0.679	0.263	0.22	18.55	2.156	0.988	0.745	0.301	0.122
1986	2.402	1.059	0.803	0.307	0.233	21.39	2.363	0.99	0.821	0.365	0.187
1987	2.567	1.138	0.858	0.343	0.228	23.73	2.479	0.992	0.848	0.409	0.230

把 CBR 做率分解,得到的结果说明,1986年比1985年增长的2.84个千分点中,第三次出生高峰(妇女年龄结构)的作用为0.84,占30%,而另外70%是TFR上升的影响。1987年增长的2.34个千分点中,年龄结构的影响约占1/3,生育水平上升约占2/3。可见,1986~1987年的回升不能简单地归因

解放以来,中国人口曾长期处于高出生的状态。70年代全国实行计划生育,生育率大幅度单调下降。到1980年,出生率从1970年的33%下降到18%。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80年的2.3。总和递进生育率从5.3下降到2.5。但进入80年代后, CBR、TFR和TPPR呈现波动徘徊(CBR、TFR)或缓慢下降(TPPR)的状态(见表1)。由表1可见,三种指标共同指出,与70年代相比,80年代生育率下降缓慢;1981~1982年和1986~1987年,生育率甚至出现回升。

于年龄结构变动所形成的人口出生高峰,生育水平的回升不容忽视。

TFR是应用最经常、最广泛的描述生育水平的指标。深入分析它的变化机制是极为重要的课题。中国妇女TFR从60年代的6.0(据1%抽样调查数据1962~1970年平均值)降低到1980年的2.3。这是中国人口从早生

多生到晚生、稀生、少生和优生，使 TFR 趋近更替水平的举世瞩目的变革。经历了70年代总和生育率大幅度单调下降后，急于解决中国人口过快增长问题的人们曾习惯地寄希望于80年代的继续单调下降，然而按其自身规律发展的人口现象远非设想的那样简单。TFR 在1980年达到历史最低点后，1981年回升到2.6，1982年又进一步升到2.86。此后三年中逐年有所下降，1985年创新的最低记录，达更替水平的2.17。但1986~1987年又出现回升，分别达到2.4和2.57，从而使1980~1987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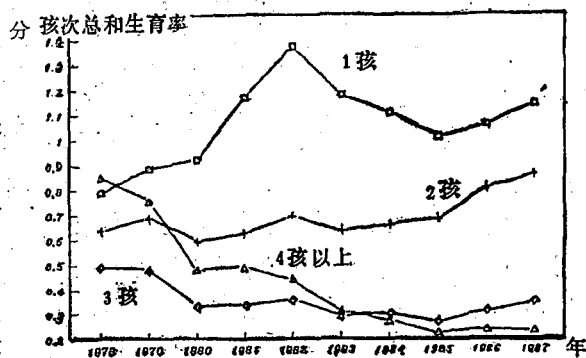


图1 分孩次总和生育率(1978~1987)

表2 80年代TFR两次回升的孩次分布

	Δ TFR	%	Δ TFR1	%	Δ TFR2	%	Δ TFR3+	%
1981	0.297	100	0.249	83.8	0.031	10.4	0.017	5.7
1982	0.251	100	0.206	82.1	0.071	28.3	-0.026	-0.2
1986	0.229	100	0.048	21.0	0.124	54.1	0.057	24.9
1987	0.165	100	0.079	47.9	0.055	33.3	0.031	18.8

TFR平均值为2.46。严酷的现实促使人们从热切的期待进入冷静的思考。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妇女终身生育水平从6降到

2.5左右(70年代水平)和从2.5左右到更替水平以下，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变化。要使生育水平突破更替水平进一步下降，其难度切不可低估。从各孩次TFR的变化看，在1970~1980年的下降幅度中，3孩以上下降约占90%，1、2孩下降仅占10%，且这10%中有相当大部分需要在80年代补生。70年代一孩总和生育率平均值为0.77，实际上这不可能是稳定的，余下23%的妇女并不是终生不生育，仅仅是推迟生育而已。为了更仔细地分析80年代TFR的变动历程，我们给出了1978~1987年第1、2、3孩和4孩以上的总和生育率曲线(如图1)。

TFR1和TFR2大幅度波动上升趋势与TFR3和TFR4+的稳定缓慢下降构成鲜明的对比。显然总和生育率的波动主要是由TFR1和TFR2引起的。

表2给出了80年代两次回升的孩次比例。结果说明，两次回升的性质有显著差异。

1981~1982年的TFR上升中，1孩占主要比重，达80%(为两年的平均数，下同)，2孩比重近于20%。1986~1987年的回升中，2孩回升比重最大，达到44%。同时多孩回升比重超过了1/5。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后果是我们深入分析的重要问题。

二、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分析

影响TFR的因素主要有婚姻状况(初婚年龄和总和初婚率)、育龄妇女孩次结构和生育年龄。

(一)育龄妇女已生孩次结构。总和生育率排除了育龄妇女年龄构成的影响，从而直接地表示了某一时期的生育“速度”。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深入分析TFR的变化时，就需要知道某一时点上，每个年龄组妇女中有多少还没有生育(我们下面称为等待生1孩)，有多少已生过1孩尚未生2孩(下面称等待生2孩)，……等等。每一类妇女所占的比例称为妇女现有孩次构成或妇女孩次结构。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比如一年)，各类妇女

的孩次构成直接影响着时期生育指标的大小。正如人口状态中年龄结构使人们预见出生高峰的到来一样,妇女孩次结构可以使人们预见各孩次出生高峰的出现和TFR的变化潜力。

图2给出了1970年、1980年和1987年中国妇女已生1孩的结构。同时也显示了等待生1孩妇女的比例(图中曲线以上到1的部分)。由图2可见,1970年23岁组有70%的妇女已生过1孩。对于这样的人群,要降低1孩总和生育率显然较为容易。1980年是70年代晚育的结果,处在该生而未生年龄的妇女比例相对要大得多。比如达到24岁晚育年龄还未生育的妇女约占一半。到1987年,23岁组已生育的妇女已回升到超过半数。同样对于等待生2孩、3孩的妇女,也可以画出类似的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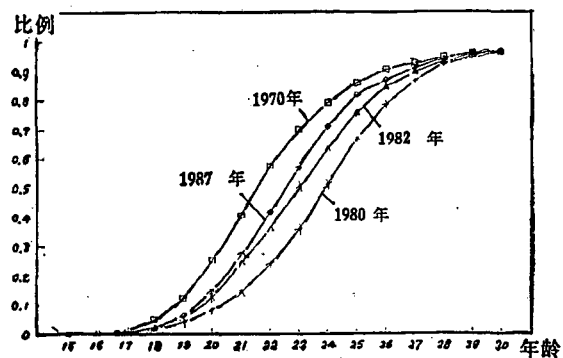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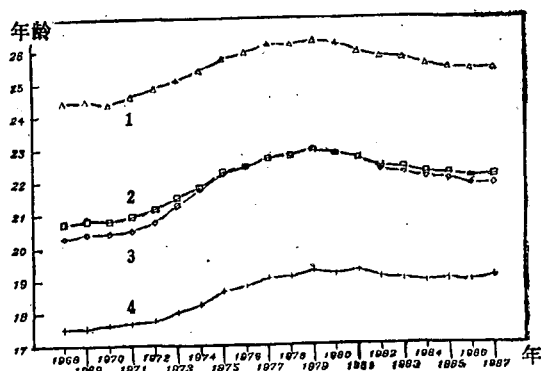
图2 分年龄已生过孩子的妇女比例

假如以1987年无孩妇女结构为准来比较70年代的起点和80年代的起点,则中国人口是带着大批该生而未生的妇女进入80年代的(俗称为“欠帐”),这批妇女进入80年代理应生育(称“还帐”),与80年代到了生育年龄立即就生育的妇女一起造成待生人群的堆积。这成为TFR尤其是1孩TFR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

(二)80年代初婚状况。80年代与70年代相比,出现了严重的婚育年龄提前,早婚早育也是80年代TFR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了便于对比,图3给出了1968~1987

年中国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70年代中国妇女向晚婚晚育方向的转化是非常显著的。在短短10年内,平均初婚年龄从20.8岁提高到1979年的22.9岁,净推迟2.1年。这在70年代TFR的下降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1980年开始,平均初婚年龄逐年下降。1981年降到22.6岁,1982年又降到22.4岁,1986年进一步下降到22.1岁。1987年有所回升,达22.2岁。但与1979年比仍提前半年到一年。



1. 当年初婚妇女中,有90%小于等于该年龄; 2. 平均初婚年龄; 3. 初婚年龄中位数; 4. 当年初婚妇女中有10%小于等于该年龄。

图3 妇女初婚年龄的变动(1968~1987)

由于晚婚,70年代总和初婚率大幅度下降(见图4),1971年降至0.7以下。此后5年都维持在近于0.7的低水平。这是个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从1976年开始总和初婚率逐年回升,到1980年已回升到1.2,1981年又升到1.35。这种回升是前一时期过度下降的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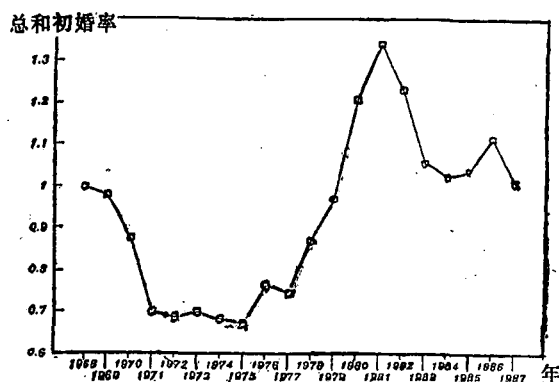


图4 妇女总和初婚率(1968~1987)

弹。它是80年代初TFR大幅度上升的重要原因。到1983年,这种补偿性的反弹已基本过去,总和初婚率此后维持在近于1的正常水平。

(三)期望生育年龄和孩次间隔。我们采用递进指标体系中的期望生育年龄(或称期望递进年龄)来描述生育年龄的变化。某孩期望递进年龄定义为当年该孩次妇女递进年龄的平均值。图5绘出了1968~1987年1孩和2孩的期望生育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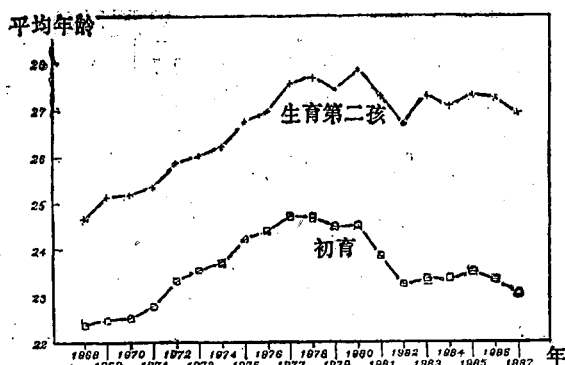


图5 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和平均生育2孩年龄(1968~1987)

与初婚年龄相一致,1孩期望生育年龄在70年代单调上升,到1977年已从1970年的22.5岁提高到24.7岁,净增2.2岁,即1孩生育年龄平均推迟了2.2年。从1978年到1980年稍有下降。1981~1982年大幅度下降,两年中下降了1.3岁。经过三年微小波动后,1986~1987年又连续下降,达到23岁。对照1987年初婚年龄的上升,说明1987年从结婚到生育的间隔缩短。

2孩期望生育年龄的变动几乎与1孩同步,同样经历了70年代上升80年代波动回落的总过程。但是其1981和1982年回落幅度小,1983年上升幅度大,从而使1~2孩期望生育年龄间隔拉开。

因为多孩生育在现代中国人口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所以这里生育间隔仅指1~2孩的间隔。

生育间隔的拉开起自1977年,到1983年1~2孩期望生育年龄之差已达3.9岁(见图6)。虽然1984~1987年间略有波动,但仍保持在3.7~3.9年之间。大约有半数的人已接近或超过了间隔4年的水平。1977~1980年是在1、2孩期望生育年龄同时增长中拉开间隔的,这使1、2孩生育率(时期指标)同时下降。1981~1982年2孩期望生育年龄下降,尽管由于回落较小而使间隔加大,还是使2孩生育率稍有增加。1983年2孩期望生育年龄上升幅度较大,是TFR回落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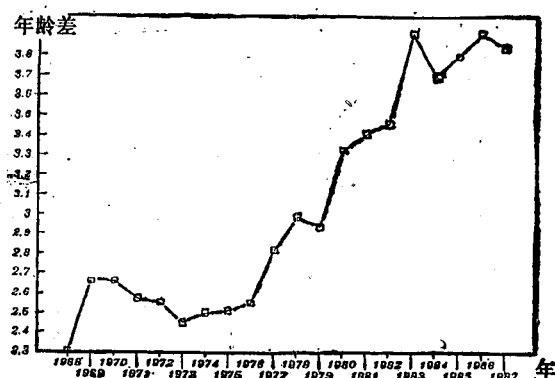


图6 平均生育2孩年龄与平均初育年龄之差

三、总和生育率的分解

总和生育率的值主要受育龄妇女孩次结构(DST)、生育年龄分布(DSH)及当年具备生育某孩次条件的妇女生育的比例(DA)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为了定量地比较各因素的大小及变化趋势,我们做率分解:

$$\Delta TFR = \Sigma \Delta TFR_t$$

$$\Delta TFB_i = DA_i + DSH_i + DST_i$$

其中: $i=1, 2, 3, \dots$, (i 表示孩次)

或者

$$\Delta TFR = DA + DSH + DST$$

$$DA = \Sigma DA_i$$

$$DSH = \Sigma DSH_i$$

$$DST = \Sigma DST_i$$

其中: $i=1, 2, 3, \dots$

率分解通常用于比较两个人口的粗率，它显示二者间各因素差别对粗率的影响。这里为了既能纵观七八十年代 TFR 的变化机

制，又能看到各孩次中的因素作用，我们选择1970年作为比较的基准。对TFR1、TFR2、TFR3分别进行计算，结果列于表3。

表3 总和生育率的分解

年份	DTFR	DA	DSH	DST	年份	DTFR	DA	DSH	DST
1孩					1979	-0.207	-0.229	-0.053	0.076
1970	0	0.000	0.000	0.000	1980	-0.305	-0.398	-0.029	0.121
1971	-0.085	-0.089	0.009	-0.005	1981	-0.274	-0.468	-0.013	0.208
1972	-0.197	-0.136	-0.075	0.014	1982	-0.204	-0.575	0.010	0.361
1973	-0.212	-0.158	-0.114	0.059	1983	-0.264	-0.825	0.053	0.507
1974	-0.196	-0.144	-0.162	0.110	1984	-0.243	-0.873	0.020	0.611
1975	-0.265	-0.188	-0.219	0.142	1985	-0.217	-0.976	0.049	0.710
1976	-0.237	-0.167	-0.270	0.200	1986	-0.094	-0.855	-0.037	0.799
1977	-0.254	-0.164	-0.364	0.273	1987	-0.038	-0.875	-0.011	0.848
1978	-0.18	-0.103	-0.444	0.366	3孩				
1979	-0.083	-0.063	-0.456	0.435	1970	0	0.000	0.000	0.000
1980	-0.05	-0.033	-0.485	0.468	1971	-0.03	-0.012	-0.018	0.002
1981	0.199	0.134	-0.492	0.556	1972	-0.069	-0.078	0.009	0.002
1982	0.404	0.284	-0.437	0.556	1973	-0.127	-0.192	0.044	0.023
1883	0.21	0.173	-0.347	0.384	1974	-0.153	-0.249	0.047	0.050
1884	0.14	0.142	-0.333	0.332	1975	-0.229	-0.271	-0.017	0.061
1985	0.044	0.075	-0.313	0.282	1976	-0.289	-0.260	-0.100	0.072
1986	0.092	0.103	-0.265	0.253	1977	-0.386	-0.512	0.048	0.080
1987	0.171	0.149	-0.212	0.233	1978	-0.41	-0.551	0.043	0.099
2孩					1979	-0.422	-0.368	-0.159	0.107
1970	0	0.000	0.000	0.000	1980	-0.573	-0.638	-0.040	0.107
1971	0.023	-0.061	0.051	0.033	1981	-0.568	-0.602	-0.099	0.134
1972	0.017	-0.020	0.010	0.027	1982	-0.544	-0.617	-0.072	0.147
1973	-0.004	-0.021	0.032	-0.014	1983	-0.612	-0.781	0.015	0.156
1974	-0.08	-0.007	0.016	-0.057	1984	-0.603	-0.667	-0.104	0.170
1975	-0.153	-0.097	0.002	-0.058	1985	-0.638	-0.692	0.139	0.195
1976	-0.188	-0.133	0.003	-0.057	1986	-0.594	-0.773	-0.053	0.234
1977	-0.26	-0.207	-0.019	-0.034	1987	-0.558	0.829	-0.013	0.286
1978	-0.26	-0.188	-0.087	0.016					

DTFR: 某年度某孩次总和生育率相对于1970年同一孩次总和生育率的增量;

DA: 生育概率大小的变化对DTFR的影响程度;

DSH: 生育模式(年龄分布)变化对DTFR的影响程度;

DST: 妇女孩次年龄分布变化对DTFR的影响程度。

(一)各分量的含意。以1980年的TFR1、TFR2、TFR3的分解为例。由表3中的相应数值得到表4。

最右边一列表示,1980年的1至3孩TFR值1.836比1970年下降了0.928(ΔTFR_i),在这总下降幅度中,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DA)使TFR1—3下降为1.069,生育模

式(生育年龄分布)(DSH_i)的作用使TFR1—3下降0.554,而妇女孩次结构(DST_i)的作用使TFR1—3增加0.696。

ΔTFR_i 一行,表示与1970年比,1980年1孩总和生育率下降0.050,2孩总和生育率下降0.305,3孩总和生育率下降0.573。DA为负值表示实际生育率低于1970年。

表4 1980年的TFR分解

	TFR1	TFR2	TFR3	TFR1-3
1970	0.967	0.986	0.901	2.764
1980	0.917	0.591	0.328	1.836
ΔTFR_i	-0.050	-0.305	-0.573	-0.928
DA_i	-0.033	-0.398	-0.638	-1.069
DSH_i	-0.485	-0.029	-0.040	-0.554
DST_i	0.468	0.121	0.107	0.696

DSH 为负值表示与 1970 年相比有更多的人晚育。DST 为正值表示与 1970 年相比有更多的妇女处在或称堆积在生育队列中。1980 年的 DA、DSH 和 DST 显示, 有很多人处在等待生 1 孩的状态, 而 1 孩的生育年龄比 1970 年的推迟 ($DSH_1 = -0.485$) 抑制了 1 孩的生育, 加之生育水平的下降, 从而使 1 孩总和生育率下降了 0.05。2 孩和 3 孩的情况则率的下降占主导地位。

(二) 率分解因素的主次和时期变化。分孩次考察 DA、DSH 和 DST 随时期变化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 影响 TFR1 的因素中, 以生育年龄和孩次结构的相互作用为主。DSH 再现了 70 年代初育年龄的推迟和 1981 年之后生育年龄的提前。DST 显示出 1981、1982 年待生 1 孩妇女的堆积达到高峰而后逐渐减少的趋势。

2. 影响 TFR2 的三因素中, 率下降一直是主要的。1970~1978 年由于待生 2 孩的妇女较少 (DST 为负值), 曾加速 TFR2 的下降, 1978~1981 年间生育年龄的推迟也在 TFR2 下降中起了加速作用。需要重视的是 80 年代 DST2 的迅速增加, 显示了待生 2 孩妇女的堆积, 预示着 2 孩生育高峰的到来。如果生育比率稍有提高, 将可能导致大量 2 孩出生。

3. 在 3 孩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中, 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 (DA 下降) 占主导地位。待生 3 孩的妇女逐年增加, 但起步较 2 孩的晚,

预计在 1991 年之后将升到高峰, 出生 3 孩的潜在势能很大, 控制 3 孩生育将面临严峻的形势。

四、80 年代总和递进率的变动

总和递进率 (TPPR) 把育龄妇女孩次构成分离出来与妇女的年龄结构一起作为人口状态变量, 而对二者进行了标准化的总和递进率作生育率指标, 其值能更近似地表示妇女预期终身生育孩子数。

1978~1987 年分孩次总和递进率见图 7。考察 1980~1987 年 TPPR1、TPPR2、TPPR3 和 TPPR4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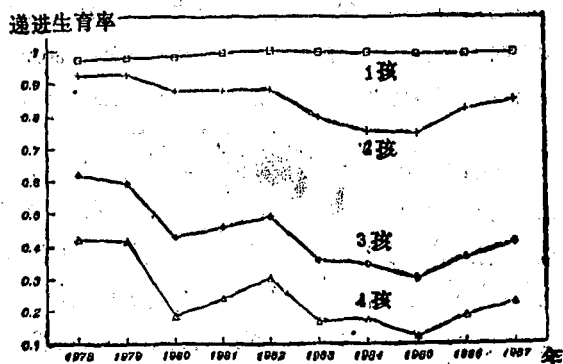


图7 妇女分孩次递进生育率 (1978~1987)

(一) 从总趋势上看, 除 1 孩几乎保持在 0.98 不变之外, 所有孩次的总倾向都是下降的。但 1986~1987 年有回升趋势。

(二) 与图 1 相比, TPPR 的 3 孩递进率与 4 孩以上的递进率显示的回升波动比 1、2 孩递进率的波动大, 而 TFR 则是 1、2 孩大幅度波动上升。二者相比, 从表示终身生育水平的角度分析, 自然 TPPR 反映的更加真实, 也与 TFR 率分解的结果相一致。TPPR1 的稳定显示当前几乎所有妇女均有生育行为, TPPR3 和 TPPR4 以上的下降意味着在 80 年代, 生育多孩妇女的比例在减少。

(三) 由 TPPR 显示出的 80 年代生育水平的两次回升, 对所有孩次都有影响, 尽管幅度不同, 而升降的方向几乎是同步的。这种现象与总和初婚率、婚育年龄等的变化的

一致性,不是人口发展机制本身能够解释的,必然有着更深刻、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根源。

为了进一步弄清80年代TPPR两次回升的性质,我们分析分孩次TPPR的年度增量。表5开列的是1981、1982、1986、1987四个年度的TPPR年度增量及各分增量所占百分比。

表5 80年代两次生育率回升年度增量

	Δ TPPR %		Δ TPPR1 %		Δ TPPR2 %		Δ TPPR3 %		Δ TPPR4+ %	
1981	0.094	100	0.011	11.7	0	0	0.029	30.9	0.054	57.4
1982	0.103	100	0.006	5.8	0.003	2.9	0.032	31.1	0.062	60.2
1986	0.207	100	0.002	1.0	0.076	36.7	0.064	30.9	0.065	31.4
1987	0.116	100	0.002	1.7	0.027	23.3	0.035	30.2	0.052	44.8

统计结果表明,就1、2孩增量相比,在1981和1982年的回升中,1孩递进率增量约占年增量的9% (两年的平均数,下同),2孩增量约占1.5%,反映了婚育年龄提前的作用。在1986~1987年的回升中,1孩所占比重甚小(约1.3%),2孩所占比重为30%,其中很可能包括“开小口”的成份。1、2孩的差异显示了两次回升性质的不同。但是,占回升增量大部分的高孩次生育率的增量则是两次回生的共同点。

1970~1980年的统计资料(据1‰抽样调查数据)和表1的数据均说明,在1970~1987年的TPPR变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多孩递进率,而1、2孩总和递进率变化不大。这再一次展示了在人口发展中,只有减少了多孩才能控制2孩的基本逻辑规律。杜绝政策外多孩,严格控制2孩是进一步降低预期终身生育水平的合理步骤。晚婚晚育、拉开间隔是缓解近期人口压力的有效措施。

五、80年代生育率变动的背景及启示

经过对CBR、TFR和TPPR的分析,我们看到中国人口的生育率经过70年代大幅度急剧下降后,80年代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

缓慢下降的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断加强。婚育年龄虽然提前了,但绝大多数仍在法定年龄之内;生育间隔稳步拉开到接近4年;多孩率逐年下降,这些都是计划生育工作成就的标志。但是,生育率下降缓慢是事实,在缓慢下降中还出现了两次回升,每次回升期为两年,回升期内各参数几乎是全面回升(婚育年龄提前、各孩次

生育率普遍上升),要深刻探求这种人口现象的根源,必须从人口发展机制以外的社会、经济角度进行探讨。

(一) 生育率变化的量 and 度。生育率

的变化存在量和度的辩证关系。变化量是每一时期与前一时期的差,而度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生产方式和生育观念等综合因素所决定。70年代中国妇女由平均预期生育6个孩子降低到80年代的2.4个,我们认为这主要是量的变化,而要使全国尤其是占80%的农业人口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则要经历一个度的飞跃。

(二) 历史遗留的问题。中国人口是带着双重的沉重生育负担进入80年代的。年龄结构形成的出生高峰和孩次结构堆积酿成的生育高峰是70年代中国妇女孕育的“双胞胎”。80年代婚育年龄的提前如同催产剂,加速了这“双胞胎”的降生。这不仅抑制了出生率的下降,也带来了人口增长率的回升和生育率的波动。

(三) 农村经济改革强化了家庭生产功能。1978年以后,广大农村的经济改革加强了家庭在现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功能。农民多要孩,特别是要男孩的愿望强烈了。

(四) 计划生育工作的失误。控制人口已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已经走上了全面抓紧的规范化轨道。然而面对社

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在农村行政机构对生产的微观控制力削弱时，对生育的控制没有及时加强。在强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口号时，忽视了晚婚晚育对缓解近期人口压力的作用，也分散了杜绝多孩生育的注意力。紧接着为了“堵大口”而“开小口”，但实际工作中控制多孩生育没有在短期内奏效。这是80年代生育率两次回升的工作原因。

总之，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人口政策，已经成为社会的一条敏感神经，因此政策稳定是必要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和社会心理学都证明，人口政策的变动，不论“放松”还是“收紧”都可能引发短时期（1~2年）的“抢生”或“超生”现象，从而使时期生育率急剧上升。

必须尊重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应当正视生育率由高到低的下降与跃过更替水平下降二者间难度的差异。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工作的深入，生育率下降的条件是可以创造的。全国平均生育水平虽已靠近更替水平，但是各地区之间、农业和非农人口之间生育率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全国非农人口的平均预期生育孩子数已远低于更替水平，达到了1987年的1.38，而农业人口和许多地区的生育率还远高于更替水平。控制人口，降低生育率的潜力仍然存在。（本文责任编辑：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杨书章、顾宝昌、肖自力；中国人口情报研究中心；王彦祖；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

（上接第31页）族势力的影响，而只能通过说服教育，因势利导，设法将宗族势力的活动限制在国家法律和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宗族势力公开从事违反宪法、违犯国家政策法令的活动，更不能让它发展成为同国家权力相抗衡，妨碍国家行政和司法等公务活动的局面。

首先，在农村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以取代农村盛行的宗族主义和家族主义。其次，要建立健全农村行为规范体系，使乡规民约行之有效，真正成为指导农民日常活动的行为准则，以取代封建宗法性的家规族规。第三，要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建设，扶植新的社会力量，防止宗族势力向基层权力机关渗透；与此相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必须强化基层组织的服务功能，以满足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下对生产和生活等方面所提出的新的需要。

然而，只要农村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尚未真正组织和发展起来，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没有真正成为社会化农业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带封建宗法性的宗族观念和宗族势力就会有继续萌生的沃土，农民“传宗接代”、“人多势众”的生育观就难以转变。要克服这一障碍，有待于完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割断人多——地多——势众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家庭经营具有现代意义，促使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念摆脱宗族观念的影响。

应当认识到，农村宗族势力复活是与土地分散经营联系在一起的。如何使土地承包制与农村人口控制有效地结合起来，乃是改变当前农民生育行为的关键所在。

（本文责任编辑：宋黎明）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